

关于处理中国经济与环境矛盾的总体观察

欧阳志远

(中国人民大学)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增长同时又交错叠加。在诸多矛盾当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它不仅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生活，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生活、甚至对外活动。要在目前这种亟待提高国民收入的背景下处理好经济和环境的矛盾，需要睿智的哲学思维。

要处理好经济与环境好的矛盾，首先必须深刻了解矛盾的历史和现状。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与人类社会是与生俱来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难以避免，只是冲突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总体情况来看，亚洲所处的生态环境劣于欧美。由于生态基底薄弱加上农业开发较早、开发较强，所以早在农业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近代以来，由于一直遭受外来侵略，所以社会就一直深陷在“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要实现社会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经过痛苦的曲折和反复的比较得到的结果。新中国建国时，中国北方国土已大片沙化，黄河、海河、淮河严重泛滥，城市基础设施凋敝破败，更为艰难的是，旧政权留下了一个基数庞大而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口架构，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严格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对国家发展进行设计，把主要精力都集注于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严格的计划经济在一开始也有其优点，这就是经济建设的环境影响被控制到较低程度。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直真诚地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平友好共处，但这种愿望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加上后来来自苏联集团的压力，成为中国领导人错误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因，这两次分别属于经济性和政治性的运动，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还使人口问题进一步严重起来。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法制观念被破坏极大，造成后来环境执法在中国特别艰难。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实行计划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跨越，由于以上原因，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也没有在中国完全真正实行。所以到70年代末，不仅经济状况恶化，而且环境状况也开始恶化起来。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出路。在经济、人口、环境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当中，经济问题的解决处于首位，不提高经济收入就无法改善人口结构，不改善人口结构就无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当然，提高经济收入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似乎又回到了思维的原点。如果用完全理想的观点

处理问题，就只能恪守原有的旧秩序。所谓发展就是突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在突破之初，不可能没有一点代价，何况我们是在一个人口基数庞大而又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国家推进工业化。

现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直到今天，仍然在依靠对全球环境容量的消耗来维系着自己的几块“绿洲”。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是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实际困难应当有足够的理解。改革开放一拉开序幕，中国政府就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有充分的预计，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措施。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吸取，中国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措施的前提下，一直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国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起列为基本国策，在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自己实际的法律法规，并开始摸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道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作为对大会精神的响应，中国政府立即率先着手制定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第一个举起了“可持续发展”的旗帜。同年，中国学者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生态产业革命”理论。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公报的形式把解决资源利用方式的问题列入全局工作。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更进一步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任务。

这些工作表明，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上，不仅在态度上是积极负责的，而且对问题的本质在不断深化。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资源利用方式问题，这一点正在干部和群众中越来越多地取得共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的环境态势，即使在发达国家当中也属于相当严峻的一类。基础如此薄弱、增长如此迅速，要在其他国家，问题肯定严重到不知多少倍。但中国目前还大体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有的项目，如西部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生态农业、自然保护区建设、黄河调水调沙、青藏铁路沿线保护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有的项目，如工业污染防治、节能降耗、城市环境治理、荒漠化土地恢复正在稳步推进。

毋庸讳言，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在继续发展，淡水匮乏、耕地锐减、气候变异、废物泛滥、水源空气污染、荒漠化土地扩展、生物多样性减少，有的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状态。但是，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城市与乡村、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2000美元，有2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200多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口，还有8000多万残疾人，每年城市需要就业人口有2400万。如果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多的人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还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冲击。较快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对环境保护带来沉重压力，这是一对相当尖锐的矛盾。可以说，这是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一切问题都难以解决。在经济和环境这对矛盾当中，经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必须围绕经济问题来讨论环境问题。要处理好这对矛盾，还要正确处理相关的其他矛盾。

要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矛盾，首先要努力建设一个节约型经济系统。关于构建有利于环境的经济模式问题，国际上有“循环经济”这个提法，所谓“循环经济”，按普遍的说法，其核心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过程。应该说，这个设想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就是要达到生态化，然而要达到生态化，“循环”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作为理想化的设定，似乎可以通过人工的推动来实现物质材料的完全循环从而保证低熵物质不致枯竭，但人工的推动难免要增加能量的消耗。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环境的熵增。同时，即使增加能源消耗，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约束，也很难让所有的物质材料完全得到循环利用；而且，能够进入循环的，很多也不得不降格使用。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自然界的能量应当是不灭的，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的传递又是有方向性的。因此，要建立“循环经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目前尚很难成立。循环经济的核心信念是把环境问题寄托于技术解决。该信念的危险在于：当问题严重到技术一时难以解决时，崩溃性的后果是否会出现？这是值得深思的。单纯的技术进步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人过分贪婪，那么往往是用技术手段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可能引发新的更大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扰动尽量控制在一个容许的范围内。比较明智而现实的做法是，积极开发能源节约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推动物质材料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这种经济可称为“节约型经济”，它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资源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其核心信念是技术解决加人文解决。节约型经济的建立，必须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基点。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开发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生态屏障地区，应当有条件地实行战略退却。

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相应地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实际上是最深层次的利益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到表现。中国社会目前有区域、户籍、能力三类显性的弱势群体，还有在政府和事业单位任职、由体制约束造成的膺弱势群体。这几类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冲突、特别是膺弱势群体中发生的泛腐败行为，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所谓“泛腐败”，是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边缘性越轨行为，它是腐败问题产生的温床。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由于中国的现行社会体制是在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跨越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民主和法制建设尚有相当的空缺需要填补，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态势之下，又只能采用一种十分谨慎的方式逐渐推进。由于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所以政府的自我完善问题在社会矛盾的调节当中就显得相当突出，其中

最关键之点就是解决泛腐败问题。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解决泛腐败问题的措施，一是改善弱势群体物质条件，二是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即使在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条件下，后者都是带有根本性的措施，而提高精神境界的着力点则是培养环境意识。事实证明，凡是生态型经济建设成就突出的地方，都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就突出的地方。培养环境意识，根本点在于培养生态寄托情感，因为它属于环境意识的心理层次。在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的产生往往与人们精神寄托的失落相关，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相当部分人的需要上升到享受层次时，生态寄托情感的培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个社会无论怎样调节，收入总是有差距的。社会稳定的基点在于，在大体公正的前提下，人们尽可能各得其所。一旦有了生态美的境界，人们就可以根据各自的条件挖掘生活的真正内质，这就有利于社会和谐。

当今世界的环境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上的恶性竞争造成的。少数国家一意孤行，坚持要把自己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一直在国际上处心积虑地制造紧张气氛。因此虽然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结束，但战争的阴云却并没有因此消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国际战争已经向世人昭示，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没有强大的国防。经济地位的下降，就意味着民族独立地位的可能丧失。历史早已并正在证明，任何民族都不会甘愿接受外来的屈辱，不可能长期受人支配。挑起这种对各方都没有意义的恶性竞争，只会造成各个国家的环境保护都承受沉重的压力。少数国家总是一厢情愿地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世界，其实，世界要保持稳定，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可不顾的，发达国家之所以目前能够保持高强度开发、高强度消费的经济水平，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世界环境容量占用较少。如果世界各国都采用发达国家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世界早就没有了生态屏障，发达国家自己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发达国家真正希望改善世界环境，就应当断然停止恶性竞争，并对后发国家进行实质性的援助。

一些人总是把中国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而且认为这是中国为了对外扩张而罔顾环境承载带来的结果。我们并不愿轻易把这种态度视为敌对，而宁肯视为无知。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和为尚的民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的主体就不是扩张性的文化，对外扩张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中国的独立和发展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没有可能按资本主义强国的道路循序渐进，只能采取非常规方式实行跨越式发展，因而弥补历史空白的任务也就是异常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保持一个富有凝聚力的中央政府，可以用高尚的理想来引导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往健康方向运行，但是，在民主和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腐败和造成失误，这些问题有时还相当严重。许多环境问题就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搁置而是正在被努力解决。如果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只能陷入空前的分裂和混乱。当社会的稳定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很难设想经济、人口、环境能进入良性循环。中国一旦失稳，才是对国际社会真正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为压制中国发展而寻找的口实。

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低下，加上“文革”对法制观念的破坏，所以环境意识薄弱。这是中国环

境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许多环境问题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由这种社会温床产生的，克服这种社会缺陷需要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为环境意识的增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为这种制度倡导的文明，与生态文明是内在一致的。虽然学者关于环境问题的真知灼见被接受有一个过程，但事实证明，这种接受程度正在与日俱增。特别是许多基层干部，一旦觉悟就义无反顾地投入生态化建设。中华民族有悠久的生态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关头都涌现出了无数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社会主义制度能把这些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Résumé: 1299cc

关于处理中国经济与环境矛盾的总体观察

欧阳志远

(中国人民大学)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增长同时又交错叠加。在诸多矛盾当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从总体情况来看，亚洲所处的生态环境劣于欧美。由于生态基底薄弱加上农业开发较早、开发较强，所以早在农业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近代以来，由于一直遭受外来侵略，所以社会就一直深陷在“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次分别属于经济性和政治性的运动，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还使人口问题进一步严重起来。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法制观念被破坏极大，造成后来环境执法在中国特别艰难。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在经济、人口、环境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当中，经济问题的解决处于首位，不提高经济收入就无法改善人口结构，不改善人口结构就无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当然，提高经济收入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现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起列为基本国策，并开始摸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道路。毋庸讳言，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在继续发展，淡水匮乏、耕地锐减、气候变异、废物泛滥、水源空气污染、荒漠化土地扩展、生物多样性减少，有的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状态。但是，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2000美元，如果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多人的人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还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冲击。

要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矛盾，首先要努力建设一个节约型经济系统。国际上有“循环经济”这个提法，其核心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过程。循环经济的核心信念是把环境问题寄托于技术解决。该信念的危险在于：当问题严重到技术一时难以解决时，崩溃性的后果是否会出现？比较明智而现实的做法是，积极开发能源节约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推动物质材料最大限度地合理利

用，这种经济可称为“节约型经济”，其核心信念是技术解决加人文解决。节约型经济的建立，必须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基点。

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相应地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中国社会目前的泛腐败行为，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解决泛腐败问题的措施，一是改善弱势群体物质条件，二是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当今世界的环境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上的恶性竞争造成的。少数国家总是一厢情愿地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世界，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目前能够保持高强度开发、高强度消费的经济水平，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世界环境容量占用较少。所谓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为压制中国发展而寻找的口实。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低下，加上“文革”对法制观念的破坏，所以环境意识薄弱。这是中国环境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克服这种社会缺陷需要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中华民族有悠久的生态文化传统，一定能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

